

王善忠〇著

王善忠美育美学文选

Selected Works of Wang Shanzhong 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Aesthetics

第2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王善忠〇著

王善忠美育美学文选

Selected Works of Wang Shanzhong 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Aesthetics

第2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善忠美育美学文选/王善忠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97 - 1578 - 9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美育 - 文集 ②美学 - 文集
IV. ①G40 - 014 ②B8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7124 号

王善忠美育美学文选 (第 2 卷)

著 者 / 王善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李兰生

责任校对 / 涂 恺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329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578 - 9

定 价 / 148.00 元 (全三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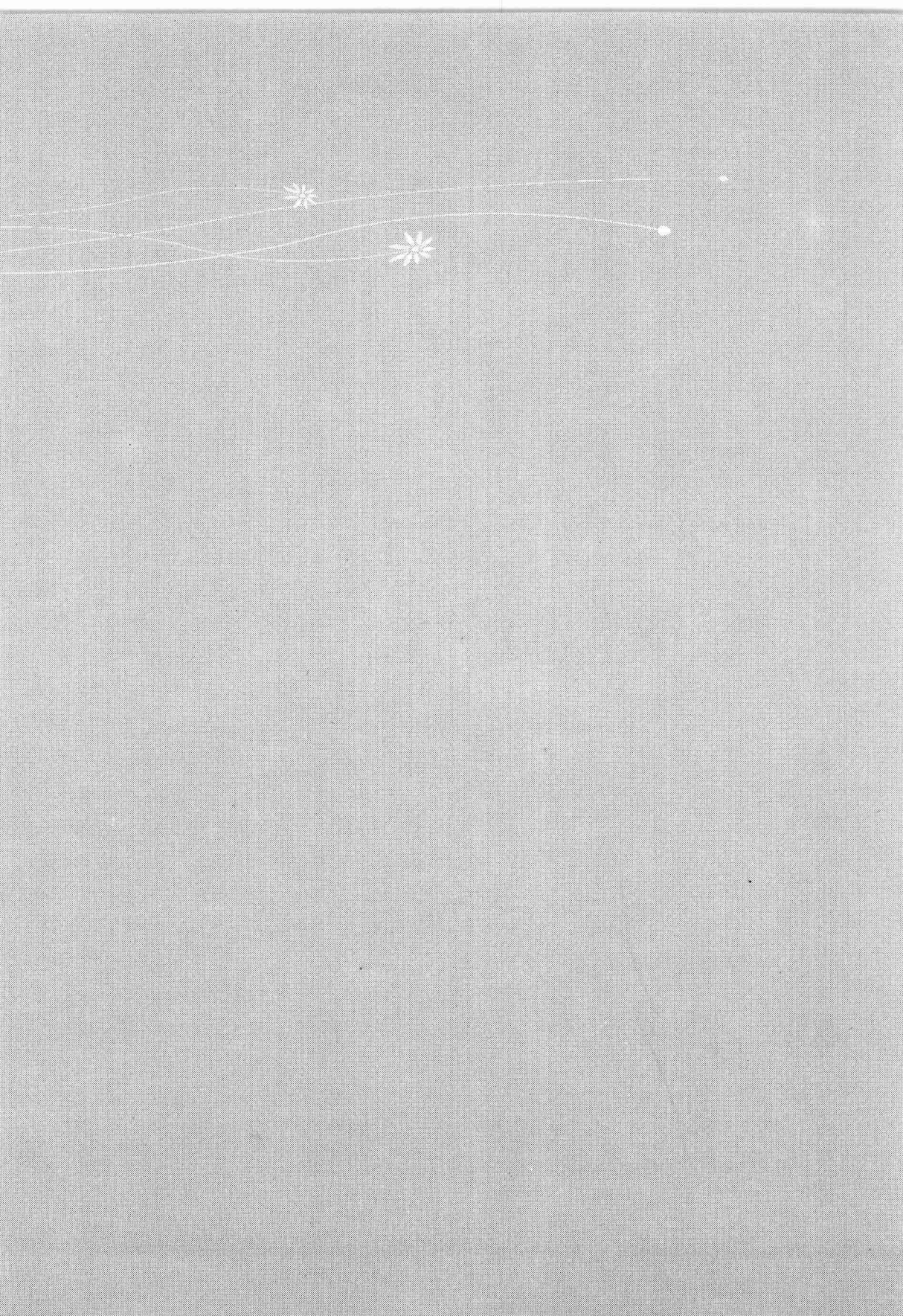
目
录

王 善 忠 美 育 美 学 文 选

- 003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初探
- 035 浅述马克思论古希腊艺术的不朽魅力
- 054 关于《手稿》讨论中的一些想法
- 064 也谈“美的规律”
- 072 怎样理解“劳动创造了美”
- 077 由恩格斯评价作品的“最高的标准”想到的
- 08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 095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美的若干问题
——纪念列宁逝世六十周年
- 123 沃罗夫斯基的美学思想
- 144 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思想
- 162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主编前言
- 172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主编后记
- 177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
- 185 中国古代美学的理性主义

- 199 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珍贵文献——《乐记》
- 218 孔子的乐论与乐教
- 227 “郑声淫”释
——读《“郑声淫”辩》有感
- 234 《声无哀乐论》浅析
- 三
- 251 蔡仪与美学
- 260 蔡仪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278 蔡仪美学思想论
- 299 余光酬盛世 夕照映霞天
——蔡仪同志晚年生活片断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初探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文艺界曾开展过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讨论中涉及的方面比较多：从生活中的悲剧事件到艺术上的悲剧情节；从小说中的悲剧因素到戏剧上的悲剧冲突；从悲剧的定义到悲剧的主人公；从过去时代的悲剧到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等。在讨论过程中，有不少同志都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以下简称《济金根》）写给拉萨尔的两封信中的一些著名论断，作为自己某些论点的强有力的依据。这其中，有的同志引用得准确，符合原意，有助于说明问题。但也有的同志不恰当地引用了经典作家的一些语句，有时甚至是持截然相反观点的同志，都引用同一段革命导师的话作为自己论点的论据。这样一来，就很难使讨论的问题深入下去，也难以取得较为一致的正确意见。

在这里，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引用者对两位导师的原著学习不够，由于各个人理解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样，在谈到具体问题时，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因此，首先要认真地学习、准确完整地领会这两封信中的主要思想内容，特别是要弄清楚它们本来的意思；其次才是如何正确全面地运用这些著名论断于所讨论的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所讨论的问题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

另外，在讨论问题中，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别林斯基曾说过：“在论断中必须避免各种极端。尽管每一个极端是真实的，但仅仅是从事物中摘出的一个方面而已。只有包括事物各个方面的思想才是完整的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73页。

真理。这种思想能够掌握住自己，不让自己专门耽溺于某一个方面，但是能从它们具体的统一中看到它们的全体。”^①我想他的这个见解不无可以借鉴之处。

本文就自己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两封信中关于悲剧问题的若干精辟见解，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写信的缘由

斐迪南·拉萨尔出身于富裕的犹太绸缎商人家庭。他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同时也是最早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虽然他只活了39岁，但他的极端的唯心主义理论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却流传至今，为各种机会主义和反动思潮所因袭，实为流毒不浅，危害甚大。

拉萨尔在1859年3月6日和3月21日分别写信给马克思、恩格斯，就他的历史剧《济金根》的写作情况作了说明。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还附上了他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阐述了作为剧本基础的悲剧观念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看了拉萨尔的来信及其剧本后，分别写了回信，不约而同地、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这个剧本所表现的机会主义路线、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及其悲剧观念的唯心主义性质。拉萨尔在5月27日致两位导师的信中又重申了这一错误的悲剧观念，为他自以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正式的革命观念的悲剧”——《济金根》进行辩解。革命导师把他的信丢在一边，不予理睬，认为它“荒唐可笑”^②。

为了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的缘由，深刻地理解这两封信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先来谈谈拉萨尔写这个剧本时的思想状况，谈谈他的悲剧观念等问题。

《济金根》一剧是拉萨尔在1857~1858年间写成的^③，取材于16世纪20年代以德国贵族弗兰茨·冯·济金根和乌尔利希·冯·胡登为首的一次

① 《别林斯基选集》（三卷本），俄文版，第1卷，第403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6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32页。

③ 参见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原序》。拉萨尔说：“这出悲剧，大部分是在1857年春，我还住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写的。因为受到其他工作的阻碍，所以直到1857与1858年之交的冬天才告完成。”

骑士反对皇帝和封建诸侯的叛乱事件。

我们知道，拉萨尔不是一个诗人，也不是一个剧作家，他自己也承认，在年轻时候连一首抒情诗也没有写过。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用韵文写这个剧本的呢？

拉萨尔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这样说过：“这个剧本并不是我决心从事的自由创作的成果，而是由于一种强制的力量控制了我，使我怎么也摆脱不开才写的。”^①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只有这一个剧本是我能写和应该写的。”^②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控制着拉萨尔呢？又为什么这个剧本是他“能写和应该写的”呢？

根据拉萨尔的自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当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和1849年因为怯懦而在政治舞台上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拉萨尔感到，“在流过那么多的血和有过那么多的事情要求复仇之后，依然不得不从事理论工作^③，……这实在是痛苦的”^④，因为“常常有一种联想使我从那里转到我们当前迫切的需要上，转到那些表面上看来很平静而实际上在我心中一直沸腾着的巨大的时事问题上”，“一道鸿沟把这些科学的、平淡理论的兴趣和今天实际上激起我们血液的一切东西分隔开来，……这就是我苦恼的原因”^⑤。很显然，拉萨尔深为德国资产阶级三月革命的失败和当时资产阶级的处境、命运而不安，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实际上，就是这种“强制的力量控制了”拉萨尔，使他“心中一直沸腾着”，但由于找不到“摆脱那窒息心胸的血液冲流的方法”，使他的“痛苦”无所寄托。

另一方面，当时拉萨尔正在涉猎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特别是人文主义者、德意志贵族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胡登的著作。他说，胡登“这个令人惊奇的人物的著作和生活使我迷醉了。有一次他的一些东西震动了我的灵魂深处”，“然后我从胡登……转到济金根这个主要主人公身上。这个念头

① 《斐迪南·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1859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6页。

② 《斐迪南·拉萨尔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1859年3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29页。

③ “依然不得不从事理论工作”，指当时拉萨尔正在写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文章。

④ 《斐迪南·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16、17页。

⑤ 《斐迪南·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16页。

在我心里刚一出现，一个现成的结构就好像出自一种直觉似地立刻显现在我的眼前”^①。在拉萨尔看来，济金根是胡登理论的实践者，是贵族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德国的“救星”，因为“济金根从头到尾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在政治上有远见的现实主义的英雄”^②。由于找到了济金根这个“英雄”人物，拉萨尔说：“于是，我能沉醉于愤慨和憎恨中了，我能让它们的波浪自由冲击了，最后我能吐露自己的心情了！这样，我找到了摆脱那窒息心胸的血液冲流的方法。”^③这个剧本就是在这种思想情绪支配下产生的。拉萨尔既在剧本中树立了济金根这个他心目中的“伟大的光辉形象”，又在济金根身上寄托了与“当前迫切的需要上”有关的思想。

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前者是他的主要目的，后者是他为达到主要目的所采取的媒介手段。对于拉萨尔来说，艺术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认为只有文艺才具有达到上述目的的力量。因此，他决定写这样一个剧本。与其说他是用诗人或剧作家的才能来写这个剧本，还不如说他主要是用他的所谓“革命”的政治动力来写这个剧本更合适些。

拉萨尔是把他的这个历史剧作为新型的革命的悲剧来写的。他在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中说：“关于我用来作为这个剧本及其大转折的基础的正式的悲剧观念——关于一切行动，特别是革命行动的性质所固有的深刻的辩证的矛盾，我当然没有在具有一般性质的序言中讲到，而是仅仅在剧本本身中第五幕里才作了比较明晰的叙述。”^④由于拉萨尔认为自己“对于思辨的思维是有一些才能的”^⑤，所以他的这个悲剧观念较为艰涩费解。

那么，什么是“一切行动，特别是革命行动的性质所固有的深刻的辩证的矛盾”呢？结合剧本《济金根》及其有关信件，我们才有所了解。按拉萨尔的意见，“这个悲剧的冲突是正式的冲突”，它“不是任何一定的革命所特有的冲突，而是在过去和未来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的革命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冲突……一句话，是革命情势本身的悲剧的冲突，无论在1848和1849年，或者在1792年都存在过的冲突”^⑥。换句话说，拉萨尔认为，他在

① 《斐迪南·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17、18页。

② 《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26页。

③ 《斐迪南·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18页。

④ 《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19~2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16页。

⑥ 《斐迪南·拉萨尔给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1859年5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45页。

这个剧本里想要表现的矛盾冲突，并不是某一过去的特定的革命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一切革命行动中最深刻的、永远重复出现的冲突和它的必然性，就是这种革命冲突中永久的现代性促使他写成了这个剧本。

拉萨尔的悲剧观念的形成是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分不开的。在哲学上，“拉萨尔是旧式的黑格尔主义者、唯心主义者”^①。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是不断地运动、发展的，而绝对观念的运动就是概念本身的自我发展。拉萨尔完全相信，思辨的概念是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理性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他认为自己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了指导自己在实际生活中行动的最高力量。拉萨尔借助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来研究德国的历史和社会现状，必然会作出机会主义的反动结论。他在《哥达纲领》中说：“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他像他的老师黑格尔一样，认为历史是伟大人物有意识的活动，它是体现“世界精神”的英雄人物或伟人创造的，而人民群众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是一种盲目的力量，他们只能跟随这些“灵魂的领导者”前进。正是基于这样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所以拉萨尔在剧本中，才“把那个时代所有的精神的光芒好像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似地集中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赋予他只有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最高的意识”^②。因此，他认为，济金根在社会发展的变革中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革命本身的成败，关键就在济金根这类“英雄人物”身上。

这一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反映在剧本《济金根》中，拉萨尔认为，骑士叛乱事件的失败，是由于其领袖人物济金根的错误和过失造成的，而他的错误和过失并不是由于他的阶级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产生的，乃是由于他本身内在的东西，即“智力的过失”、“理性的谬误”造成的，所以在转入行动时，他犯了“策略错误”，因为他“在实现目的的方法上实行了狡诈”，这就构成了“革命的目的”与“外交手段”之间的矛盾，导致深刻的悲剧性的结局。在拉萨尔看来，虽然济金根的目的（他自认为这是“革命的目的”）是“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③，但他在实现这个目的时，却采取了“狡诈”的“外交手段”，所以他灭亡了。例如，本来是为了民族的事业，

①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57页。

③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9页。

国家的统一，完全可以公开地直接向皇帝、诸侯宣战。可是济金根佯装成只是为了金钱的争吵，而向一个诸侯宣战。他说：“我现在要他们（指诸侯——引者）把这次战斗看做是我自己的私人争端。”（第三幕第六场）妄想以此瞒过诸侯，麻痹他们。因为济金根所抱的信念是：“小事情常常会转变成伟大的事情，而正是由于它微不足道的外表，它成为我们去完成伟大事业的手段，使偶然的事件转化为必然的命运。”“给伟大事业带来胜利！”（第三幕第五场）但结果并不像济金根臆想的那样，他的“狡智”不但没有“给伟大的事业带来胜利”，反而由于他的狡诈手段，迷惑了朋友，致使自己更快地走向灭亡。

拉萨尔选取了济金根骑士叛乱事件作为他的剧本的题材，是想从这个叛乱的结果上表明，在他看来，失败的悲剧不单是这个叛乱，而且是任何类似的革命情势所固有的客观的悲剧内容。具体地说，这个悲剧的内容是在于表现革命领袖的革命目的和机会主义策略之间的矛盾。用拉萨尔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要表现“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的现实的解决，以及这种矛盾的内在的必然性”^①。但在实际上，这矛盾的“现实的解决”，不是以革命领袖的胜利来结束，而是以他的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在革命领袖身上，存在着两种思想信念的冲突，即所谓“在构成革命的力量和狂热的思辨观念与表现上十分狡智的有限的理性之间，看起来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解决的矛盾”^②。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了悲剧的结局。一方面，拉萨尔认为，革命的力量在于革命的狂热，在于观念对自己本身的强力和无限性的直接信赖。而狂热为了在有限的现实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深入到现实的错综复杂中去，必须借助有限的手段转入行动。另一方面，狂热如果同有限的事物搅在一起，狂热如果从属于有限的事物，它便决不能实现自己，相反地，而是放弃自己正式的原则，即观念的无限性，使自己委身于自己的对立面，即有限性本身，而它的意义却就在于消灭这个有限性，因此，狂热在这里一定要遭到毁灭。由此看来，革命运动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革命领袖或英雄人物所预见的目标，因为有限的手段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无限的目的的，所以革命都是由于革命领袖的“理性的谬误”、“策略错误”而失败的。拉萨尔认为，悲剧正是来表现这种矛盾冲突的。

① 《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21页。

② 《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21页。

在剧本《济金根》中，当济金根在转入行动即将宣战的时候，他为了重视既定的有限的手段，对于敌人，甚至对自己人，始终“隐瞒着运动的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并且借助对统治阶级的这种有意的欺骗，以及对统治阶级的利用，来获得组织新力量的可能性，以使用这种靠聪明得到的一部分现实来战胜现实本身”^①。这样，他就不得不去寻找同现存制度的妥协，如济金根企图说服皇帝查理和他一同完成国家的伟大事业，而为了要与现存制度妥协，必然使得自己和群众的联系断绝，造成“不能在自己面前消灭受骗的敌人和在自己背后获得朋友，而必然是在自己面前有着敌人和在自己背后没有自己的同志”的结局。正如巴尔塔扎尔对济金根所说的：“您费尽心机，不过把这次争论是为了民族一事，瞒过了您自己的朋友；因此民众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您就弄得聪明反被聪明误。您本来可以做出丰功伟绩来，可是在小事情上失败了！在大事情上使用狡诈，因此而丧命的，您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第五幕第二场）所以，拉萨尔认为，表现在济金根身上的矛盾冲突，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他的这种过失是智力的，是以在一切转变时期不断反复出现的思想冲突为基础的，所以它已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人物的过失，而本身已成为一种必然的、永恒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便招来了他的悲剧的命运。正是这种以永恒的和必然的客观思想冲突为基础的智力的过失，拉萨尔以为才能构成最深刻的悲剧的冲突。这个由1522年革命情势所产生的悲剧冲突是正式的冲突（因为在大事上使用狡诈，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它不是任何一定的革命所特有的冲突，而是在过去和未来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的革命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冲突，因为遭受失败的大多数革命都是碰到这种狡诈而垮台的。这就是在拉萨尔看来，不仅是使16世纪济金根失败的原因，而且是使1792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使1848~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

总之，从拉萨尔写这个剧本的动机到他的悲剧观念，从他的剧本《济金根》到对当时迫切的政治需要上，无不渗透着拉萨尔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及其机会主义路线。对于“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自视“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②的政治小丑来说，很有必要及时揭穿他的机会主义面目，所以马克思

① 《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20页。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4页。

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这些错误思想、理论及其剧本进行了严肃的、公正的批判，并提出了关于革命悲剧的一些著名论断和宝贵意见。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历史、哲学，甚至经济学著作中，尽管我们碰到不少有关戏剧方面的词汇，如悲剧、喜剧、闹剧等，但集中论述戏剧理论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我们看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可算是最早（1843年）论述有关悲剧本质的文章，其中一段为不少美学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经常引用：

“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①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即被不断前进的历史所淘汰的旧制度，是怎样归于覆灭的。马克思的这个著名论断，对于我们研究美学上的悲剧理论有着直接的意义和重要的启示作用。首要的是这一论断使悲剧理论具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来自他对历史和社会制度的研究，而不是直接来自他对美学和艺术实践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些词汇的含义在当时也不完全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严格的美学理论上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给拉萨尔信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悲剧的理论，是对1843年论断的重要发展和丰富。革命导师对拉萨尔的剧本所进行的分析、批判，是运用这一理论于文艺实践的光辉典范。通过两位导师对剧本的剖析，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悲剧的含义、性质、冲突、内容，以至主人公等方面）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对我们研究戏剧理论、评价戏剧创作、衡量过去时代的悲剧作品和指导悲剧创作都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这两封信时，有一个很值得深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思，也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尽管两位导师事先并没有交换过对剧本《济金根》的看法，但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观点却是一致的，如对拉萨尔的悲剧冲突的看法；对主人公济金根的评价；对16世纪农民和平民运动的看法，以及对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对工人和农民群众运动的看法；再如对文艺创作的一些特点的意见，特别是对悲剧的性质、悲剧的主人公的见解等。所有这些意见的类似，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再加上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等状况的充分了解，从中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的分析，所以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恩格斯认为，悲剧的基本性质在于反映“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①。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指那些顺应了历史发展过程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了历史必然性的要求。在历史进展过程中，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制度，不断被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一切社会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上升阶段，都有其合理存在的时期，到了衰落的阶段，又有被其他先进的制度所代替的必然灭亡的时期。一切合理的、正义的事件或人物的符合社会发展的种种要求（即人生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社会生活的前进过程中遭受失败或毁灭，这就是生活中的悲剧性现象。这是决定悲剧性质的首要因素，也是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关键所在。而所说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指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因为在阶级社会的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或正义的力量、美好的思想，有时候有些失败，但这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的正面力量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或邪恶力量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它的“必然要求……不可能实现”，其结果常常以先进势力或正面人物在斗争中的失败或牺牲而告终。若把这些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这就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写成戏剧作品这就是悲剧。

对于悲剧的含义，由于人们所处的历史时代、阶级立场、社会地位不同，历来就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衡量悲剧的尺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运用阶级观点来考察一切问

^①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

题，他们在谈到戏剧理论，特别是悲剧理论问题时，着重注意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问题，注意到被压迫群众的自身解放问题。两位导师并不像拉萨尔那样，抽象地谈什么悲剧观念或是有几种类型的悲剧等问题，而是首先指出构成悲剧性冲突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根源，然后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提出他们的革命悲剧的标准，即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构成革命悲剧。这就不仅精辟地揭示出悲剧的社会本质，而且也使悲剧具有了革命的进步的内容，使悲剧艺术在争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中发挥应有的战斗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是在批判拉萨尔唯心主义悲剧观念及其剧本《济金根》中表述出来的，从批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位导师并不认为历史剧《济金根》是真正的革命悲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拉萨尔所选择的主题和题材不适合于表现出真正的悲剧性的冲突，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济金根叛乱事件并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因而不能构成真正悲剧的因素，也就不能称其为革命悲剧。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16世纪初，随着封建帝国的解体，原来德国的统治阶级，即贵族阶级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又由于当时社会等级的繁多，再加上这些等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悬殊地位、差别，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十分复杂。当时全国处于诸侯割据、各地独立的分权状态，这种情况不仅加重了城市平民和农民的负担与痛苦，也引起日趋没落的贵族骑士的不满。而帝国政权和大领地诸侯都阻挡不了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市民、骑士的反对情绪。这些力量对封建诸侯割据的德国的政治制度构成了很大威胁。

当时的德国社会大致分为三大部分：皇帝、封建诸侯和僧侣属于掌权的统治阶级；市民阶级（也就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和大量下层贵族属于改良派，以路德为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是这一派的代表；农民和一小部分平民则属于革命派，以闵采尔为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是这一派的代表。

济金根和胡登则是改良派中的下层贵族（骑士阶层）在军事、政治和思想、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他们一方面希望把宗教改革变为帝国反对罗马教廷的公开斗争，妄图通过战争把骑士阶层提到重要的地位，建立一个专靠骑士阶层的军事力量的强大帝国，从而恢复它以前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改变现有的政治、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封建统